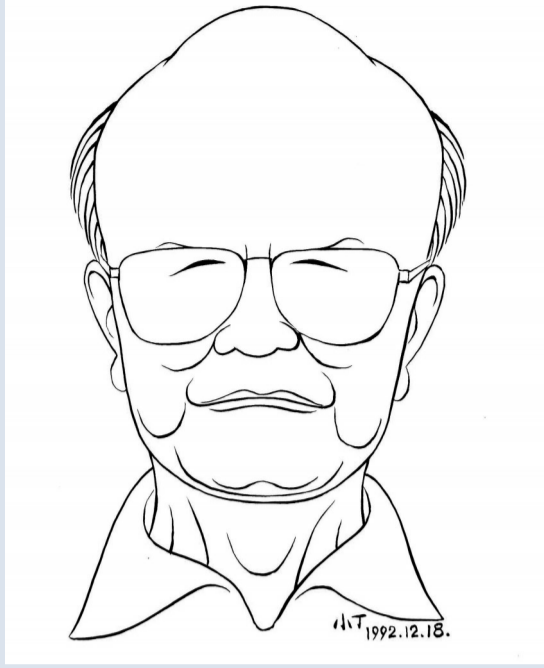


新时期文学的开路先锋

——陈荒煤与新时期文学 □白 烨



陈荒煤速写
丁 聪 作

经典作家之陈荒煤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走过了40年的历史进程,也铸就了前所未有的历史的辉煌。回顾这段筚路蓝缕的行进过程,仰望这得来不易的文学伟绩,人们不能忘怀那些为新时期文学竭尽心力的人们,尤其是那些披荆斩棘的开路者,激浊扬清的先行者。

在新时期文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的进程中,文学的组织领导者、作家艺术家、理论批评家、编辑出版家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做出了各自的突出奉献。但相对而言,在那样一个劫后复苏的特殊时期,文艺的组织领导者因处于改革开放的风口浪尖,置身思想解放的前沿阵地,地位更为重要,作用更为重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高度评价周扬、张光年、陈荒煤、冯牧等老一辈革命文艺家的功德。而陈荒煤作为其中的一位,因在文艺组织的恢复与重建、文艺思想观念的拨乱反正、文艺创作新潮的推波助澜等多方面的除旧布新,不避汤火,呕心沥血,更引人为之瞩目,也更令人难以忘怀。

志在文学创作的陈荒煤,自青年时代写了一些小说、报告文学之外,1938年进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任教之后,就根据当时革命文艺运动的需要辗转于各个解放区,基本上以文艺的组织领导工作为主了。全国解放之后,他先后任过天津市军管会文艺处处长、武汉军管会文教部副部长、中南军区文化部长,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电影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直到“文革”前夕被“下放”到重庆,之后一直处于被批判、被管制的境地。

1978年,恢复工作的陈荒煤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协助所长沙汀主持日常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是“文革”后最早恢复的学术机构,复出之后的陈荒煤,在这一时期,迅速进入履职状态,倾注着极大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繁忙而紧张的工作。据了解内情的王平凡回忆,这段时间,由陈荒煤

主持或主办的大事即有:组织全所同志进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依托《文学评论》,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思想流毒,澄清被他们搞乱的文艺思想;主持编辑《周恩来与文艺》《周恩来与艺术家们》;提出总结30年社会主义文艺工作的经验与教训,并在所内外作《关于总结文艺30年问题》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更好地发展文学事业等重要报告;受院领导委托,在1979年主持召开“全国学科规划会议”;为错划右派的同志落实政策,面向社会招聘年轻的研究人员,落实研究生的培养计划与教学工作。这些工作,立足于文学所,辐射于文艺界,无论是对于文学所的工作迅速走上正轨,还是文艺界恢复正常工作状态,都起到了积极而有力的引领与推动作用。

同一时期,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恢复工作。1979年间,还在文学所副所长任上的陈荒煤,先后出任筹备恢复中的中国文联党组书记,中国作协临时党组代理书记,并参与了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第三次作代会的筹备工作,并在第三次作代会上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81年2月,陈荒煤重返“文革”前的岗位,复任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工作。1982年,改任文化部顾问。在此期间,他除去电影领域的创作与生产、研究与评论的组织与领导工作之外,还主导或参与主导了一些全国性文学与电影学术团体的组建与成立,如中国鲁迅学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中国夏衍电影学会等。可以说,在百业待兴的新时期,他为文艺事业的恢复和建设投入了最大的精力,付出了最多的心血。而且这些工作十分广泛,行业相当多样,跨越了文学、文艺和文化,涉及到研究机构、政府部门和民间团体。在新时期文艺的复苏与建设中,陈荒煤显现了他多面手的卓越才能,也做出了多方面的重要贡献。

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其优势独具的体制与机制,依赖于深谙文艺规律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正是这种体制的有效保障,机制的有力运行,这些组织者、领导者的秉要执本和尽职尽责,才使新时期文学有了波澜壮阔的奋勇前行,并走过90年代的风风雨雨,阔步走向新的世纪。因此,着力于新时期文学体制与机制的恢复与建设,又多方面发挥自己的组织能力与领导艺术的陈荒煤,不仅既往开来,建树甚多,而且拔新领异,独一无二。

陈荒煤与周扬、张光年、冯牧等老一辈文艺界领导者一样,有着相似的经历,多重的身份。他们都是以从事文艺工作的方式投身于革命事业,兼有文艺界领导人、作家、理论批评家的多重身份。因此,无论是身处研究机构,还是文艺团体,抑或是党政部门,他都有着敏锐的思想警觉,活跃的理性思维和强烈的问题意识,并以顺应时代潮流,切近文艺规律的方式,大力推动文艺界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拨乱反正的斗争。

陈荒煤到文学研究所之后,便着手主抓了两个方面的的工作,一个是以《文学评论》《文学研究动态》等刊物为平台,在文艺思想观念上,彻底揭批“四人帮”,深入批判“两个凡是”,以突

破“左”的禁区的新闻问题、新观点,推动文艺战线思想解放不断向前。另一方面,提出以周恩来重视知识分子、推动文艺发展的文艺思想为指导,总结新中国文艺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为此,他撰写了深刻解读周恩来重要文艺讲话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献》等文章,力求在阐发正确文艺思想的同时,厘清文艺的思想路线,端正文艺理论思想。对于陈荒煤在这一时期的作用,与陈荒煤同过事又了解他的许广民表述过这样的看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文艺界贯彻执行拨乱反正的斗争中,文艺界的一些老同志一直在前面作为先驱,起着振聋发聩的作用,陈荒煤就是其中的一位。”“我以为,正是从那时开始,文学研究所的工作逐渐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在1979年的四次文代会之后,文艺界逐步掀起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大讨论。陈荒煤在这一重大文艺问题的讨论中,不仅在文学所组织大家积极讨论,各抒己见;而且利用一些全国性学术会议在更大范围开展论争。如1980年的庐山召开的全国高校文艺理论研究会,就以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为总议题。身为研究会顾问的陈荒煤,不仅全程出席,聆听发言,参与讨论;还在会议的发言中明确指出:“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不够全面,不够科学。它不能概括文学艺术全部复杂的现象,不完全符合文学艺术的特征规律,并不能概括文学艺术的全部功能。”“这些旗帜鲜明的意见,有力地推动了这一讨论走向深入并取得积极的成果。”

因为长期从事电影事业的组织领导工作,陈荒煤在这一时期也特别关注电影界的思想解放与创作发展。1978年,他到云南昆明开会,听说电影《阿诗玛》的女主演杨丽坤因在“文革”中遭受迫害而精神失常,由此联想到好的电影不能公映,优秀的演员背负罪名,骨鲠在喉的他回京之后,便写了一篇情真意切的文章《阿诗玛,你在哪里》,发表于《人民日报》。文章虽由电影《阿诗玛》的个案说起,但涉及的却是怎样看待“十七年”期间的影片,如何对待辛勤付出的电影工作者的重大问题。这篇文章发表之后,立刻引起很大反响,并直接推动了“十七年”影片的解禁和遭受迫害的电影工作者的相继平反。但写这篇文章,陈荒煤冒了很大的风险,面临了很大的压力。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对此文很有意见,使得胡乔木和周扬先后找陈荒煤谈话。陈荒煤写给周扬写信说明情况之后,在信的末尾坦然表示:“无非要官,去做老百姓”。揭真相,决不掩饰,态度是何等坚决;说真话,绝不屈服,精神是何等的无畏。这怎能不让人为之敬服?

新时期文学在创作上的第一声春雷,当属“伤痕文学”。而“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卢新华的《伤痕》甫一发表,陈荒煤就看到这一作品在伤感之中隐含的思想锐意,代表的新的创作倾向,毫不迟疑地及时著文予以支持。随后,伴随着“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归来者文学”、“知青文学”等倾向向人们走来的新人新作,陈荒煤都以作序、写信、撰文等方式,予以热情的评说,积极的推介,可以说有求必应,不遗余力。正是这种热情评新作、积极推新人的做法,使他成为新时期中发现“千里马”最多的文坛“伯乐”之一。

荒野中的萌芽

——陈荒煤其人·其作·其思 □孙艳琳

小说创作活动。同时,作者最擅长的从实际生活中取材取象、表达真实忧郁情感的写作风格也初步展露端倪。20岁刚出头的陈荒煤,孜孜不倦地写了不少小说和散文,如小说《男子汉》《刘麻木》《人们底爱》,散文《在忧郁的记忆中的故事》等,并在女工夜校教语文,还负责辅导工人排戏。陈荒煤23岁时在《作家》创刊号上发表短篇小说《长江上》,受到好评,还被茅盾选入《短篇佳作集》。同年,陈荒煤短篇小说《忧郁的歌》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推出一颗冉冉新星即将在文坛升起。

《长江上》和《忧郁的歌》带有典型的陈荒煤早期创作特色。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反动势力极为猖獗,革命暂时处于低潮,劳动人民啼饥号寒,堪可称为中国历史上布满血泪的最黑暗的时代。作家在《长江上》中以其独特的阴暗笔调深刻地刻画了劳动者、知识分子和流浪人的生活:一个叫做独眼龙的从前当过码头工的退伍兵在长江轮船上跟着做茶房的他从前的老伙计住在一块。作者就描写他住船上的一段生活和他的身世回忆,以及他周围几个人的日常生活和习惯。在他们那种油污环境里的油污生活的表面之下,有多少由生活所掀动的灵魂的风浪和人性透迤!多年的漂泊生涯之中,“独眼龙”的身体渐渐垮了,老婆孩子也都不见了,家更是早就没有了,眼前的生活,是“一天一天破灭了”的长江都能引起他的悲感。阴郁与悲感交织的时代阴影之下,全中国不知有多少“独眼龙”都遭遇着和他一样的生活:出门去寻找较好的生活,带回到却只能是一个更坏的境况。在船上永远临不到太阳照耀的下舱里,独眼龙又要走了,“他不惯于平凡而充满了油污的生活”,但,他又走到什么地方去呢?作者没有给我们答案。也许任何人都无法给出那个答案,只有社会和时势知道。作者借助对这类长江水手的生活,写出一类“油污”的下层者的灵魂,自然带着非常浓郁的忧愁,但作者把这种忧愁当作社会结构的毛病,结尾处透露出对新社会的隐约展望。船过另一省界的时候,独眼龙指着那里的山头,说那里的兵都不肯打了。这是意味深长的暗示,更是作者深思熟虑后祭出的慈悲。这

个时期正是作家从苦闷中挣脱出来坚定地奔向革命的思想转变时期,结合后期对自我作品的剖析,“一个人的思想和认识也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逐渐成熟的,不可能所有的观点都是一贯正确的”(《解放集·前言》)。作者始终坚持以真实的笔触去写自己熟悉的题材,因此体现出一种渴望表现的热情,“主要是那个时候,尽管年轻幼稚,但的确是真实的感受,甚至暴露了不健康的感情……然而,它却是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中的产儿。”(《荒煤短篇小说选·自序》)

鲁迅曾说,“一个艺术家,只要表现他所经验的就好了……如自己并不在这样的漩涡中,假使以意为之,那就决不能真切,也就不成其为艺术……(创作)不必趁时,自然更不必硬造出一个突变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陈荒煤的此类小说,正是通过对普通生活和人物的真实描绘和独特表现,广泛而真切地反映出时代的社会现实,从而使其作品,为我们今天了解当时人民的苦难生活及其精神面貌提供了一面镜子。

“七·七事变”及北平沦陷后,陈荒煤与他那些流亡的同学组成“北平学生流动剧团”在山东、徐州、河南一带活动,曾在南京公演了独幕剧《七·二八之夜》。该剧由陈荒煤和他的好友郭安尼共同写作完成,由此开启了作者另一种才能:创作剧本。此后,陈荒煤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任教,后转入文学系,代理系主任,同时继续自己的写作事业。他先后带领鲁艺文艺工作团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采访并亲自在前线参加了两次战斗,搜集了大量八路军的材料,尤其是他对陈赓将军进行了深入的采访,同年,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写作了《陈赓将军印象记》(刘伯承将军会见记)《新的一代》等报告文学。年幼时来自父亲有关“革命”的血脉延续,结合母亲和姨母带给陈荒煤的文学启蒙,在这个青年身上尽情地与绽放;童年和少年时代那些如影随形的贫困、压抑,都化作他笔下那些温暖真挚又深刻妥帖的文字。不到30岁的陈荒煤在参加完毛主席主持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及时创作了独幕剧《我们的指

挥部》,同时要求深入基层进行创作,继续写出反映时势的优秀剧本和文学作品。1945年日本投降后,陈荒煤带领部分鲁艺的同事离开延安去游击区工作,之后又决定留在边区筹建边区文联。此时的陈荒煤,肩上的担子已经不止是一位创作者,他开始承担更多的行政和领导职务。写作依旧是他的爱好。1945年底,短篇小说《一个人的觉醒》由重庆雅典书屋出版。30岁出头的陈荒煤,生活得忙碌又充实,他的人生之路开始渐渐走入一个新阶段。

陈荒煤先后担任过边区文联副理事长、《北方杂志》主编、北方大学文艺研究室主任、华北文联常务理事、石家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华北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委员、天津军管会文艺处长、武汉市军管会文教部副部长兼文艺处长、中南军区与四野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并代表中国作家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纪念活动和访问,中间发表文章、通讯、报告若干,并出版报告文学集《新的一代》及论文集《为创造新的英雄典型而努力》。1952年10月,陈荒煤被调回北京,担任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由此开启电影事业的研究和分析工作。他不断有文章发表于《文艺报》和《人民日报》等重要期刊杂志,并主持召开诸多电影方面的重要会议,努力落实体制改革,并带领队伍出国参加在捷克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电影创作会议,即使是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仍坚持对电影事业的指导和分析工作。他一边积极带领团队去国外吸取经验,同时努力应用和改革国内的电影创作和评论机制,并在理论研究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夏衍评价他为“(他)把编剧、导演、演员当做同志、当做朋友,对他们有感情,所以话讲得坦率,既有由衷的欢喜,又有中肯的批评……我觉得,对中国电影来说,这是一条很重要的教训。”而这种真实,无论是表现在电影行业还是文学创作上,恰恰正是陈荒煤自幼时代便已确立的写作风格。“我始终觉得在学习期间,应该尝试着去写各种题材……我尝试着从各种现象里面去发掘题材,而且尝试着怎么去写它”(《长江上·后记》)。“艺术性,是指把现实生活中本质的东西加以整理、组织和集中,使得生活更有现实性,更有典型性,而绝不是生活以外的东西”。如果说青年时代陈荒煤的作品是一支忧郁的歌,那么参加革命后,他从敞开的心扉中所唱出的就是战斗的

歌,也是更加振奋人心的时代之歌。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电影剧本或评论,都是作家在创作道路上不断探索和追求的结果,更是历史的产物。陈荒煤笔下所流露出的强烈的时代特征,正是其作品保持鲜活生命力的深层原因。

但历史发展总有曲折,波及到个人则是。10年“文革”刚开始的时候,陈荒煤也被停止了工作,在不同地方之间调来调去,惟一不变的是接受批判,甚至在已经56岁的年纪再次入狱,度过了长达7年的监禁生活。等到60多岁的陈荒煤入狱时,当年好友已零落无几。至少他还是幸运的,几年之后平反,先是在重庆市图书馆抄写卡片,后被调回北京,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关于此后的一些文学创作,陈荒煤这样剖析自己:“建国以后,我完全放弃了创作,只是结合工作的需要,写了一些评论文章。怎么也没有想到,经过十年动乱,重返文学工作岗位上来,居然又提起笔来写了一些散文……我也相信,老年人的心灵,经过几十年的斗争,渐渐被千丝万缕的种种欢乐、激情、悲痛、不幸所不断缠绕,也终会形成一层硬壳。但正如俗话说,人心总是肉做的。它不能通过热血的循环而跳动,不能不随着思想情感的变化而跳动,它终究不能变为一颗只记载历史年龄的化石。”正是因这份实事求是的责任感和始终如一一的谦虚原则,陈荒煤始终认真对待自己笔下的每一个字,把写作当成一门科学,一门艺术,始终遵循着文学艺术的特殊规律,来分析种种文艺现象和探索艺术发展的奥秘,这使其既能写出对具体现象精到而细腻的分析,又能对全局运行和发展趋势有明察的洞察力。鲁迅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明火。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污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等到已年近70的陈荒煤谈到从前和现在,也说:“一个建设社会主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伟大新时代已经开始了。但愿我今年近70的老人,也还能为迎接一个新世纪的到来,为新一代写点新的散文。”他做到了。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